

#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再生产及其层次<sup>\*</sup>

林 密 王玉珏

**[摘 要]**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比物质条件本身的再生产更为重要,因而是资本主义研究与批判的核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与变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所内含的潜在层面逐渐凸显,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的焦点,其先后呈现出来的三大主题——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实际上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三个重要层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理论视角,本文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资本研究思路的时代发展及其理论得失。

**[关键词]** 社会关系再生产 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 空间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5.05.017

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历史之本。确立这个历史本体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基于这样的认知前提,进入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生产进程中,把握其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抽离了历史具体内容的一般生产及其研究,虽然是有必要的,但不足以真正把握历史演进的机制。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所面对的理论对象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当中进行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必然就包括了与其相应的社会形式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资本研究思路之中,诸如自然的界限、历史与文化的界限,以及劳动者的身体之生理界限与社会生活的道德界限等等,都在不同时期构成了资本发展的界限。但历史与现实表明,资本逻辑已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克服了上述的各种界限,并将它们统统纳入到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宏大体系之中。这是马克思已有着墨但尚未详

细展开剖析的现实过程,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试图解剖的新“人体”。如果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资本分析思路已经为资本再生产的宏大过程大致勾勒出了一张草图,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与变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诸多潜在的层面逐渐凸显,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理论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先后展现的三大主题——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实际上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三个重要层次。本文认为,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为焦点,一方面我们将看到马克思资本研究思路所具有的内在张力以及向时代敞开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们梳理西方马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4CZX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内在逻辑关联,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变化的理论主题所始终围绕的逻辑中轴并评估其理论得失的新视角。

### 一、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再生产

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中,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影响。其中,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是影响最为显著的两个思想家。因为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提供了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权力关系的重要分析。其核心贡献可归纳为如下四方面:(1)避免了经典模式的还原主义;(2)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看成是在历史性建构的关系中统治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的竞技场;(3)反对将霸权简单地等同于统治阶级的统治;(4)理解西方民主中‘一致意见’产生的中心性和复杂性。”<sup>①</sup>德沃金的评述十分精当,不过应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卢卡奇的理论贡献。在源头之上,卢卡奇借助韦伯的思想资源,将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合理化过程分析,推进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层次当中,涵盖了政治构架、法律与心理意识等层面,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物化意识结构。这一物化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现实的压迫与奴役现实,构成了无产阶级丧失主体意识、暂时遗忘历史使命的重要原因。克服的方法,正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总体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卢卡奇而言,以合理化外观包装的物化意识结构,已然冲破了生产过程,走进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

这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霸权,后来借由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将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塑造过程推进到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当中,引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言说。此后,有关意识形态的研讨自然就拓展到生产过程之外,并且成为主导性的理论视野。代表性研究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思路,还有日常生活与文化批判转向。诚如德沃金所言,意识形态与霸权问题成为了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方式的焦点问题,也是反抗资本霸权、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策略的重要切入点。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即是例证。只是在

理论的聚光灯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也逐渐溢出了马克思生产分析的视野,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的现实结构。一方面,这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通过意识形态实现自我再生产这一过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给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的生成可能性贴上了历史的封条。这便是阿尔都塞的困境,也是以威廉斯、汤普逊、霍尔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北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布洛维,却逆流而上,重回生产车间,从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与劳工协作互动方面探讨意识形态的“同意”制造机制,从中试图发掘工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sup>②</sup>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布洛维此举是对葛兰西霸权思想的活学活用,但却在不经意间,将日渐悬浮在生产过程分析之上的意识形态研讨重新拉回到了“生产车间”。于是,从马克思,历经卢卡奇、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等人,到了布洛维这里,似乎完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辩证法的圆圈。恰恰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逻辑对于意识形态的倚重及其裂隙。因而,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让每一个社会个体成为其需要的“主体”这一问题上,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层次之一。在历史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涨潮退潮过程中,意识形态这块暗礁总会时不时地显露出来,从而吸引了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眼球。

总体而言,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由物及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凸显出来了。这是一个从生产过程分析逐渐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分析的理论过程,也是一个从意识形态虚假性指认到意识形态能动性、结构性现实分析的过程。就意识形态而言,也就从一个外在观念体系与物化现实结构合谋的骗局,进化成了一个由无产阶级自我施加的现实认同。意识形态理论的

① [美]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② 参阅[美]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这一个跳跃也并不是单纯在逻辑上完成的,而是有着其深厚的现实根源。这就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与繁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假象和意识形态的消费社会及其丰裕景象,却成了无产阶级认同并自我施加的真正“现实”。问题是,这是一种在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因此,日常生活自然就成为了社会批判理论必须深耕的新领域。

## 二、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再生产

在创立一种新的历史科学之初,马克思明确地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历史之本。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过程当中,马克思虽然并未对资本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殖民问题展开论述,但他有关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辨识以及拜物教分析和批评等零星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在理论表层上涉及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日常生活层次问题。在深层逻辑上,当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比生产的直接物质成果更为重要,或强调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比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为关键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与批判开启了方向。

在一定意义上,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认知,构成了沟通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桥梁。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布罗代尔将日常的物质生活视为一种变化相对缓慢的长时段结构,而那些受到历史研究青睐的社会变革与动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与个人等一切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历史变化,都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布罗代尔要考察的这段历程,实际上是一种从基础性的物质生活过程中脱胎而出的市场经济体系——亦即我们现在习惯指称的资本主义,一步步走出“自己家里”——流通与交换领域,并进入“别人的家里”——生产部门的历史过程。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日益强大而且似乎看不到边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掌控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与经济生活,甚至侵入了思想文化等领域。

布罗代尔描述的这个“侵入”过程,正是马克

思所简单描述过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转向文化工业批判、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聚焦于消费社会批判的现实支撑。他们的各自理论表述,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范围与层次的扩散。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经济生产过程进行的。对于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马克思并未展开分析。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等人无疑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讨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他们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将这一过程推进到狭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日常生活当中,推进到人们的休闲、娱乐、消费以及家庭与教育等各个生活场景之中。例如,列斐伏尔就明确指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只是发生在工人阶级行动、思考和被限制的社会场所(即在企业中)。社会关系是在广义的市场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在市民中被再生产着。它们同时也在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分配和消费的场所,在社会的普遍性机能——艺术、文化、科学和其他领域(包括军队)中——再生产出来。”<sup>①</sup>

不难发现,在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那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发生的领域已经冲出马克思视野中的经济生产过程,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指认了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全面异化现象这一事实,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沦为资本逻辑的操控客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欲望、心理、生理与想象力都变成了消费控制的对象或手段,甚至人们满足欲望的方式也被社会隐性操纵着。所谓的社会主体实际不过是被消费意识形态隐性控制和塑造的假象,成了漂浮在“社会想像投射的世界”中的欲望符号和“主体幻象”。现代社会彻底沦为了商品的世界和一个“假装的”欲望普遍化的消费社会。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中所有异化现象的实质正是资本主义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现代日常

<sup>①</sup>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1978, p. 96.

生活中的各个阶层正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不自觉地参与并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全面地组织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可见,他们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准确地说,是在现代社会的整个日常生活中探讨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问题。因此,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视野中的与生产过程紧密不分的生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经济合理性由企业向整个社会的扩散的问题,不仅仅指证了关系再生产的领域由经济生产过程向社会生活全面扩散的事实,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它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残存并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所在,即资本主义关系合法性的再生产问题。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早已隐含在马克思的思路之中,只是到了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那里,这个问题借由日常生活这一论域更加凸显了。

马克思多次强调,工人把物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把他作为工人的身份以及与资本家的关系生产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远比物质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更为重要。到了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那里,不仅关系的再生产已经全面扩散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它自身的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例如,列斐伏尔指出,源于企业内部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有的东西,并且把企业的技术理性推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质是指认了资本逻辑已经冲出经济生产的过程并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全方面殖民的事实。更进一步讲,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被全面认同并实现其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这一点,其实也是卢卡奇开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题中之义。在卢卡奇看来,从生产过程出发向生活过程蔓延和渗透的物化—合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认同机制。这一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到了葛兰西那里,是一种囊括了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内容在内的霸权体系;到了阿尔都塞那里,则是一个隐匿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之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消费兴起的时代,在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看来,意识形态的

合法性认同机制主要体现在消费意识形态之中。资本主义控制和引导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每个个体进行意识形态“盗梦”,即通过广告媒介、文化教育等方式,将一种“虚假的意识”或一种关于生活姿态与方式的欲望和想象置入每个社会个体之中,让他们在追逐这些虚假欲望的满足过程当中收获主体的存在感与自由平等的幻觉,从而对于资本主义打造的物质丰裕的消费时代感恩戴德。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等人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深层次的异化现象,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视阈来看,其实质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臣服,并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由资本的逻辑来规划,从而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泛化,同时也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合法性。

### 三、空间与资本主义再生产

如果仅从排除了生产过程这一狭义的日常生活视角来定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确实容易走入一种让人绝望的悲观境地。列斐伏尔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的中后期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消费社会批判的历程中,那些被传统左派理论寄予厚望的潜在革命主体,无一例外地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合法性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与行动的萎缩已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列斐伏尔的弟子鲍德里亚将这一消费社会批判的逻辑推向了极致,物—符号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自主体系,原来在列斐伏尔那里还尚存总体性革命希望的消费者,已经彻底沦为了符号体系的对象与客体。在马克思那里,基于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的关系,到了鲍德里亚那里就发生了彻底的倒转:物—符号体系的自我再生产取代了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地位,并决定了人和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之中,源自社会关系内部的反抗已经彻底成为了不可能。列斐伏尔意识到了从狭义日常生活这一视角来透视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局限性,借由都市化过程与城市空间等问题的研究,他回到了早先坚持的总体的日常生活视阈中,即包含了生产过程在内的广

义日常生活视野。<sup>①</sup> 基于这样的总体性视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考察推进到了空间的视阈之中。

从日常生活到空间,在理论形式上确实存在着跳跃,但在逻辑上却是连贯的过程。这里有一个逻辑过渡,即社会关系再生产与资本主义幸存的问题。对列斐伏尔而言,从早中期的日常生活批判到后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其贯穿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列斐伏尔始终将社会关系再生产作为核心视轴。他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幸存的秘密在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取得自我合法性的再生产。而随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效应与矛盾(或资本全球流动的空间拓展与冲突)、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冲突与矛盾等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凸显,列斐伏尔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核心机密已经不再只是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而且是对空间的殖民。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幸存的秘密在于通过占有空间,并生产和再生产空间。正是在空间这一视阈当中,先前的日常生活这一主题得到了更完整的展现,同时也将人的意识形式与生活想象、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自然资源、能源条件等)等维度也纳入其中。在空间的视阈之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总体性过程就更加明显了。

在一定意义上,空间并非列斐伏尔另起的炉灶,而是一个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突显出来的众多主题融为一体的新平台。因为,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绝非传统社会理论所忽略的自然给定或绝对化的容器,而是一种由社会实践活动塑造和推动的空间过程,其本质是实践的、社会的和历史性的,其核心正是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特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必然是一种空间生产的方式,它不仅在空间中生产,同时也生产出它所需要的空间,因此其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生产。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物质产品和社会关系的同时,必将同时生产出一个属于资本逻辑的空间。如此一来,借助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视野,列斐伏尔就从空间中物的生产批判走向了空间生产的批判。

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路,紧紧

抓住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核心视角,推进和完善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分析。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而言,哈维有两大比较明显的推进。

其一,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时空机制的研究。哈维从宏观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劳动分工、中观的城市化过程研究、微观的身体过程这三个视阈,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时空策略及其后果:即“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空间重组与“周转时间加速”。在哈维看来,这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全球各个空间层面上生产和再生产着不平衡与地理差异。资本周转时间加速的内在要求,推动了社会生产与消费往快速化、景观化、影像化、数码化等形式的快速转化,这也是德波所关注的“景观社会”的背后逻辑。总之,资本积累的时空策略在于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成为一种无根性的存在,但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在现实的效应上,资本积累的时空机制让社会个体处于一种破碎化、瞬间化、原子化、高速流动的状态之中,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等文化体验与理论表述。另外,从身体这一微观层次的空间来看,资本积累通过各种方式塑造着身体,使之成为资本积累的策略。例如,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等人在消费社会批判当中所提及的诸多手段,如控制与引导消费欲望、制造虚假需求或以广告传媒与文化教育等方式塑造引导的“理性消费”理念等,都是资本积累过程对身体的规训过程。因此,哈维反对将身体视为一种给定的生理事实,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身体过程”。不仅如此,哈维还将身体的思考置入到马克思的资本分析逻辑当中,从可变资本循环及其与整个资本循环体系之间的关系入手,将身体这一微观空间的分析与其他层次空间的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始终贯之以劳资对抗与冲突的核心视轴。这样,从微观的身体,到中观的都市空间与日常消费过程,再到宏观的资本全球

<sup>①</sup> 本文认为,列斐伏尔前后期的日常生活概念实际上存在内涵上的异质性。早期列斐伏尔以狭义的生产过程为界划标准,其日常生活概念主要被限定为生产之外的休闲领域,代表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1947)、第二卷(1962)。列斐伏尔后期的日常生活概念涵括了劳动实践过程,近乎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之基——物质生活,代表作为《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参阅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第五、六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流动与不平衡发展,哈维实现了在不同的时空层次之间辩证的穿梭。借助这种“空间的想象力”,哈维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维度及其内在矛盾更加明显也更加具体地凸显出来了。

其二,哈维的过程—关系辩证法与社会生活多环节相互内化于过程之说,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研究的方法论模型。就空间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哈维既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逻辑,也拒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为了打造一个能对空间、地方与环境等关系形成辩证把握的认知图式,哈维求助于思想史上的辩证法传统,打造了一个过程—关系辩证法。其中,过程对于物、关系与结构等具有绝对的逻辑优先性,后者是前者的产物与后果,并且都必须在总体过程的认知当中得到定位;过程的发展动力在于内在的矛盾冲突的推动,基于这种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主体—客体、原因—结构、现象—本质、偶然—必然、普遍—特殊、整体—部分、时间—空间等成对出现的这些概念相互依存并相互内化。依据这种纲领性的过程辩证法,哈维将社会生活划分为以下的六个环节:话语/语言、权力、思想/欲望/幻想、制度、物质实践、社会关系。这六个社会生活环节或过程在社会过程当中相互内化。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是单独发生作用,都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内化的过程。<sup>①</sup>

哈维的这一分析模型对于我们探讨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以及分析有关学者的社会再生产思想之得失,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具体而言,当某一学者立足于前人所未曾遭遇的新历史情境,将社会生活的某个环节和过程凸显为主导性的过程,并作为独立的因果力量时,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了。我们必须思考,这个学者所论及的,是他认为在当下社会秩序再生产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与其他环节的关系他是否论及了,他怎么看待的?他依据所捕捉的这个环节,来探寻历史变革力量时,其理论有何得失?比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直接对应的是泰勒的生产流水线,也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语境。但他提出的内化至心灵的物化模式,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一种迷药,这种迷药致使其丧失了反抗资本力量的意志,也迷失了斗志方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实现了巩固与扩大。如果仅凭

这一点来责备卢卡奇夸大了意识的作用,显然并不公允。借助哈维的社会生活多环节相互内化的分析模型,卢卡奇所看到的,恰恰是将其他环节内化了的意识形态这个环节。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为卢卡奇辩护。事实上,卢卡奇的问题本身也恰恰在于,他将意识形态这个环节拔得太高了,视为一种社会因果力量来考虑,并且他对反抗主体的论证方式以及对反抗斗争的可能性空间的论证,最终都没能回到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去,从而实际上是将社会生活辩证统一的诸多环节割裂开来了。又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思路,由于将消费这一环节拔得太高,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被视作一个独立的自主过程,未能看到社会生活其他环节在其中的内化过程,最终也走向了彻底的悲观境地。

总之,以资本积累的时空机制与内在矛盾为核心关注,哈维完善和拓展了列斐伏尔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本文看来,哈维是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语境化要求当代化了,延续的也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核心逻辑与最终旨趣。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于,后者都简化或甚至抛弃了马克思完整的生产方式分析思路。深谙马克思资本分析精髓的哈维,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辟蹊径”及其遭遇的理论困境应该是有过深入思考的。当他以资本积累这一理论视角来统合各种分析路径时,他不过是将原本完整后来却分裂了的再生产分析视野再次实现了整合,同时力图在具有跨时代特性的、普遍性的生产方式分析与具体的、富有时代特性的资本积累方式分析之间实现了辩证统一;在时间视野与空间分析之间实现了辩证统一;在普遍意义上的劳资矛盾与具体情境中的种族、性别、阶级等斗争之间实现辩证统一。哈维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升级,恰恰是在不可摆脱的思想史语境与现实语境分析的矛盾当中树起的一面“新”旗帜。事实上,如果我们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的总体视野和方法,我们会发现,哈维树起的这面崭新的旗帜,无疑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

<sup>①</sup> 参阅[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第四章。

义学者都更加明确和坚定地扎根于马克思的思想沃土之中。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对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问题推进到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等层次当中。其核心问题在于以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为中心视轴的资本界限问题。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的界限时,将自然空间、历史与文化都视为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必将要打破的界限,资本最终的运动边界在其自身。从再生产过程来看,资本主义一步步从流通领域走进了生产、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最终成为了遍布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主导秩序。这是一个多向度、多层次展开的过程,表现为意识形态(无意识层面)、日常生活与文化、空间等层次,以及在这些层次之间游走的其他主题,如国家、科技、性别与生态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中立的、无辜的存在,社会各方面因素或多或少、或久或暂、或有意或无意地推动了资本扩张与自我再生产的过程。

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问题,我们将获得一种新的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的视角。就资本主义研究与批判来说,其逻辑主轴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物质条件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排除在外了。相反,任何时候它都构成了不可忽略的现实基础。只是,就资本主义本身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而言,物质条件再生产的危机及其爆发时对人们生活与思想的冲击力,都受到了上述其他几个层次的中介。甚至,这些中介本身掩盖了基础,成为了现实。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转向、日常生活转向、空间转向等特质的主导因素。如果因为卢卡奇、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批判的视角停留在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文化心理等所谓的“上层建筑”层面,或者因为他们的解放出路要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如列斐伏尔的“节日”复兴和文化革命)、要么在激进的反抗中透露着强烈的悲观底色(如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或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从而将他们的理论框定在人本主义或结构主义的

逻辑当中加以定位或简单拒斥——这无疑是一种曲解和矮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因为,这种解读模式事实上也掩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研究所做出的重要推进。从再生产的理论视角,我们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紧随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机制本身的时代变化,用各自的方式把马克思限于时代而未作详细拓展的再生产研究推进到经济生产之外更为广阔的领域当中,从而在理论上才明显呈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比如,列斐伏尔对于素来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不仅指证了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殖民,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的方式把日常生活全面组织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并悄悄地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合法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值得肯定的是,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与再生产关系的分析不仅切中了资本主义新时期的演变与时代特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运用和拓展,从而为我们探寻资本主义得以幸存并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从这一视角来看,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对于我们把握新时期的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转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整个动态生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那个基于雇用劳动与资本对立的、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文化等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意义如何重大,但在根本上,资本主义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本质属性并无变更。因此,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仅仅停留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层面展开批判并在这一层面寻求解放的道路,那么最终的解放道路就难免陷入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寻求解放道路与策略制定上遭遇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也根源于此。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集美大学思政部)

(责任编辑:李 慕)